

中国现当代

乡土文学研究

上卷



主编 王光东

本卷主编 杨位俭

聚集在「文学与乡土」主题下规模巨大的中国文学——包括各种观念和实践——是一笔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土既是文学表述的核心，又是文学经验解我们自身的历史，进入本土性与现代性、诗学与政治、共同体想象与文化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大学中国现当

项目编号 S30101

中国现当代 乡土文学研究

上卷

主 编 王光东
本卷主编 杨位俭

本卷编选
常 峻 庞 敏 王 聰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王光东主编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
ISBN 978 - 7 - 5473 - 0224 - 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乡土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②乡土文学—文学
研究—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020 号

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上下卷)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637 千
印 张：34.75
版 次：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224 - 8
定 价：78.00 元(上下卷)

编 委

王光东 钟宗宪 黄景春 杨位俭
李 娜 许 斌 常 峻 姚 涵

前 言

乡土文学观念与研究思路的思考

杨位俭 许 畔 王光东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中,广义的乡土文学可以涵盖一切书写乡土的文学形态,而狭义的乡土文学则是与一定的文化、文学语境和叙事特点相关,譬如1920年代初期的乡土写实小说、1940年代沦陷区的乡土文学运动等。本文是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因此也就必然涉及与“乡土文学”相近的一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譬如农民文艺、农村题材小说、乡村文学等等。这些相近的概念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文学价值诉求和作家对于“乡土世界”的不同理解方式及想象方式。当我们说“农民文艺”时,强调的是乡土社会中的“阶层”属性,而“农村题材小说”在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又总是与“政治性”的主题相关……这些概念的内在指向虽然有些差异,但都与“乡土世界”发生深刻的精神联系并构成了广义的“乡土文学”重要的书写内容。本文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观念变化和研究思路的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乡土文学观念的演变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研究中,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说明乡土文学观念以及概念命名的演变和内涵,然后才能进一步探讨研究者的思路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 “五四”乡土文学观的发生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是较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论家。他主张以“地方性与个性”来抵抗新文学中概念化、抽象理念的强制,“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而文学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1]周作人将“土气息泥滋味”视为真实的文艺表现,并且看作文艺的生命,这与当时强调文学的功利取向背道而驰,尽管周作人刻意强调风俗画面和地方趣味,但这并不简单意味着“趣味主义”和“贵族情调”,其中实际上隐含着更为宽容的人生态度和人文关怀,以及对于草根生活价值的独特发现,因为在周作人这里,“地方性与个性”才是构成文学性最核心的东西。“自然的具有的个性”和民风民俗是具有生存意义的自在形态,即使他提到了“国民性”,这也是一种具有“世界眼光”的观照方式,因为他认为“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同时期的茅盾也曾提出,“我们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2]很多人将此解读为茅盾与周作人乡土文学观的分歧,这其实是很大的误会,一是周作人本来就没有将地方色彩简单地看作是浮光掠影的趣味性和采风式的东西,而相反主要是强调乡土艺术中的内部视角和自在个性,并以此反对普遍理念对地方性和个性的强制;二是周作人和茅盾早期的乡土文学观念都与欧美“Local Colour”创作潮流有深刻的联系,文学研究会时期他们俩的理论基础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对神话等民间叙事以及风俗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熟悉丹纳有关“种族、环境、时代”等所谓文学决定因素的理论,重视“为人生”的文学取向,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和失意时的消遣”等等。周作人和茅盾都不可能不知道风土和民俗表象背后还有深刻、复杂的民间生存经验及地方性知识系统,而茅盾有关“错综相”的说法虽然含混,但也可以看作是对“地方色彩”复杂内涵的辩护,至少他不同意将“地方色彩”简单视为风景描写或异域风情。

鲁迅在“五四”早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既具有丰富独特的“地方色彩”,又不乏深刻的社会关怀和批判意识,也就是说,鲁迅早期的乡土文学实践与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也并非截然对立。钟敬文曾经用民俗学方法对《故乡》等文本进行过解

读,这说明鲁迅的作品也并非只能支撑“国民性批判”的政治眼光。鲁迅 1935 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一些青年作家乡土写作的评论是一种回溯的方式,用左联时期的眼光看 1920 年代初、中期的创作,其中难免会放大文学观念的分歧,“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3]学界多以此论作为乡土文学研究的起点,但仅凭这几句话我们还是无法确切地还原鲁迅关于乡土文学范畴的准确界定,而只能在文学史的联系参照中,大致确定鲁迅乡土文学命名方式——而且必须是限定在 1930 年代这个特定的时段——的区别性的观点。首先,鲁迅不太认可乡土的“自在”特性,或者说,经由作家观照的乡土不可能是“自在”的,无论是蹇先艾的贵州,还是裴文中的榆关,它们都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的“故乡”,故乡成为重要的言说之物是因为作家们已经被放逐,这种言说方式既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乡愁,也是对失落的文化传统或者自我同一性的召唤,因此,鲁迅是通过乡土文学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认同断裂和“无家可归”式的现代精神困境;其次,鲁迅以揶揄口吻批评那种以“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的乡土艺术,显示他明确反对周作人以“世界眼光”为“地方性”构建的核心位置,在鲁迅的乡土文学观念里,地方性与个性并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相反,对于那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国民性”的批判立场以及其中潜隐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关键所在。

在周作人提出“乡土文艺”的同一时期,茅盾已经开始关注以农村、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但他并没有使用“乡土文学”概念,而用“农村小说”、“农民小说”等去命名这类作品,直到 1935 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他还习惯性地对“地方色彩”保持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发现,相比较那种将“地方色彩”视作“错综相”或者特殊色味的说法,在 1930 年代左翼文学时期的论述中,茅盾的观点还是发生了一些改动,前者通过“地方色彩”来强调地方性和特殊性,后者明显支持乡土写作中承载的普遍性的“共同命运”;前者可以容纳风土文化自在性的观念,后者偏向于建立在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基础之上的社会改造意图,“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4]这个时期茅盾更倾向于把“地方色彩”看作乡土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美丽的背景”，而没有刻意强调“地方性”，他所说的“游历家的眼光”或者“异域的图画”也并非是乡土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全相。通过郁达夫在1927年《农民文艺的实质》中归纳的四种“农民文艺”形式可以粗略窥知“五四”以来乡土写作的状况：

1. 以同情的态度，对农民生活状态的写实叙述；2. 从主观方面为农民申诉、呼喊，完全为农民而作的文艺；3. 有地方色彩的农村文艺，一种 regionalists（地方主义）的作品；4. 开导农民、启发农民的知识文艺。^[5]“知识分子向天，农民向地”，各取一端为两极，中间则是容纳共生的领域，有偏向地方主义和农民本位者，也有偏向普遍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本位者，郁达夫将第2种看成农民文艺的正统，而认为第4种——也就是启蒙和动员的知识文艺是当时要求最急切的。这两个路向综合起来看就是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先声，但是毫无疑问，左翼文学运动仍然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理想色彩，对所谓“趣味主义”的批判其实是左翼文学思潮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话语建构方式，话语竞争的背后，乡土文学还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生存价值。

（二）“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小说”的转换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小说”命名的转换是值得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因为在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很少用“乡土文学”命名“乡土书写”的作品。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以台静农、王鲁彦、蹇先艾、许钦文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多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农家的辛苦和物质的贫困，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民所受的沉重的阶级压迫及其精神痛苦”。^[6]“这乡土写实的一脉，到30年代左翼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吴组缃、丁玲、沙汀、艾芜等人，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叙写演变成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普罗小说的一翼，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了”。^[7]而以废名、沈从文等京派为代表的一脉乡土书写则“以温和舒缓之笔表现乡土民情”，^[8]包含宽容醇厚的文化意味，这种美学风格在师陀、萧红等人的小说中得到延续，并对后来的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沦陷区乡土文学是一种殖民地背景下民族主义意识的曲晦表达。在乡土文学倡导者的理论中，“国民性”、“民族性”和“现实主义”等是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林榕在《新文学的传统与将来——兼论乡土文学问题》中试图将沦陷区乡土文学与汉文学民间传统和“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相接

续,但是他强调的“民间为人”和“以人间本位”这一层面,并将其作为“树立国民文学的根基”的东西,比较来看,他更接近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以个人为出发,以国民性及民族性为基础,发展为广大的世界性,以消除人间的界限与距离”。^[8]在周作人那里,“国民性”是“世界民”的角色,这是现代中国启蒙文学的重要诉求之一;然而沦陷区乡土文学理论家重提“国民性”,却是民族主义的根底,强调古今接续、新旧皆同,实际上隐含着民族身份自我确认的重大意图,因为林榕认为“国民性是由一个国家传统的风俗习惯而来,民族性是由种族历史的进展而获得。”^[9]上官筭(关永吉)在《揭起乡土文学之旗》一文中,就更直接地提出乡土文学“就是指那一种反映社会现实,暴露人生真态,具备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把握了时代的意义与人民的要求,以及赤裸裸的呼吸于中国乡土之间的文学作品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独自的国土(地理环境),独自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自的社会制度。由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着的作家,他在这国土、语言、习俗、历史和社会制度中间生活发展,其生活发展的具象,自然有一种特征。把握了这特征的作品,就可以说是‘乡土文学’”。^[10]台湾同期发生的乡土文学运动也有类似的诉求。

在“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1930年代出现的“乡土文学”的两种倾向——以茅盾、沙汀、艾芜等人为代表的左翼乡土文学和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乡土书写,在其后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某种历史性的转换,也就是左翼乡土书写的倾向开始演变为主导性的文学潮流,政治性因素在明显加强,而乡土小说的地方性因素和个性化的乡土文学经验在不断地缩减,从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成为作家写作的根本动力,这一时期地方性经验和方言土语的运用都是为了唤醒下层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这种特点与1930年代前期“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有着前后相续的联系。在解放区出现的“赵树理”以地方性的语言、生活经验以及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完成了这种文学性的创造。与赵树理的文学写作相关的是1930年代末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和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等一系列事件推动着具有地方农民特征的审美习性和叙事形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赵树理的创作恰恰适应了这一文学要求,他之所以受到肯定就是在“乡土书写”中呈现了政治性的因素。他自己就认为写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在这里我们已经发现了后来“农村题材小说”概念提出的关键性问题。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农村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普遍展开,文学创作中的“政治性因素”得到普遍强化,而地方性的个性受到压抑。因此,从“乡土文学”到“农村题材小

说”的命名，实质上隐含着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学的要求。在“十七年”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当地方自在性和差异性不断缩减、“乡土”的独特审美特性消融于“政治主题的统一性”中时，“乡土文学”也就只能被“农村题材小说”命名取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乡土文学”的变化，同时也能理解在194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方言文学”运动为什么在文学发展中没有充分展开的原因，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单纯的语言形式问题已不是重要的文学问题了。

(三) 新时期乡土文学的概念嬗变与经验断裂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支持下，乡土文学观念呈现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发展面貌，部分学者认为“乡土文学”受限于五四新文学的语境限制，开始尝试用其他概念来替代乡土文学，如“乡村文学”或“乡村小说”。乡村文学的概念最早见于赵园的著述，她在1993年《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一文中指出，“乡土文学”是一个“歧义丛生的名目”，倾向于用乡村小说进行论述。在这之后，不少学者也开始使用“乡村小说”的概念，如邹平《城市文学的衰微与乡村文学的兴盛》等。但这一概念直到在段崇轩的《农村小说：概念与内涵的演进》一文中才逐渐明确，他明确指出相较于乡土小说，“乡村小说”“具有较强的涵盖力”、“很有弹性”、“富有诗意”。^[11]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使用“乡村文学”和“乡村小说”的概念。^[12]有学者认为，“‘乡村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所以它宽广的外延可以用来指称所有描写乡村（乡镇）生活，揭示农民生存状态和文化性格的小说，以及那些有描写乡村生活而思考民族文化、民族个性、人类生存等一系列形而上命题的小说”。^[13]而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并不认同“乡村小说”或“乡村文学”的概念，他们认为，“以‘乡村小说’的命名来替换传统的‘乡土小说’之谓，这一置换本身就是对传统‘乡土’概念文化精神内涵的一种强行剥离，是对‘土气息泥滋味’中的‘气息’与‘滋味’的强行拆除，并更多地表现出趋从于题材决定论的意味”。^[14]与此相对应，他们更为认可“新乡土文学”、“新乡土小说”的概念，特指20世纪80年代后以农村为题材的文学创作。金汉在较早提出了“新乡土小说”的概念，他从美学、叙述方式、人物形象塑造、风俗描写等多方面指出区别：“新乡土小说一般不只从社会的、政治的层面上开掘生活，不单一地为了揭示和回答某种社会现象或政治问题，而是超越这一切，对生活作整体的文化的观照，意在揭示人类生存的文化状态，呼唤作为社会变革深层和终极目的的文化变革。”^[15]这种论述着重强调了乡土文学中的文化因素，并不足以概括新时代背景下的全貌。在这之后又有不少作家开始使用这一概念，试图对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写作进行

重新界定,[16]但总的说来,在“多元与无序”的格局之下,论述更多是建立在经验性和批评之上,缺乏整体性的理论建构,同时也无法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尤其在19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大规模迁移、乡土传统进一步崩解等背景下,乡土写作面貌发生了更大的改变,新的乡土审美形态尚未得到准确把握和理论概括,新的概念的出现隐含着人们发展、拓展完善乡土文学理论的迫切需求,概念竞争本身即是乡土文学观念变迁的一部分,这也意味着,我们仍然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延伸的观念史和美学史进程中。

二、乡土文学研究的几种典型思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乡土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整体且开放的话语体系,我们需要在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深刻把握这一问题相对完整的谱系结构。伴随着多种文学思潮、研究方法的进入和乡土文学实践的丰富拓展,198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研究也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一系列综合性的乡土文学史研究专著纷纷面世,同时,乡土文学的专题研究、作家和作品专论也更加细化,各种理论视阈丰富呈现,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研究路径。

(一) 现代性研究视角

一般认为,乡土成为重要的文化和叙事观照对象是现代性介入的结果,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就主要提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发现”并有距离地观照乡土的问题,严家炎也指出:“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17]城市给予写作者现代性的生活体验和思维模式,正是因为这种新的意识和情感给了作家以新的眼光,“中国乡土小说的主流是以支持和呼应的态度来对待现代性,它的方式也与现代性内涵完全一致——就是改变乡村”。[18]虽然现代性视角是进入和把握乡土文学的重要路径,但是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学界普遍注意到的社会意识形态现代性、政治制度现代性,而且还包括审美现代性、传播现代性等等,从传统—现代自然转换的角度而言,本土现代性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而从西方现代思想和殖民力量对中国的强势改造来看,本土现代性的发生则是一个横向移植和被动挤压式的过程,因此笼统地谈论现代性无法理解乡土中国的真正困境和文学写作的矛盾构成。本文主要从现代启蒙意识和现代化进程两个具体层面进行把握,意识层面强调的是启蒙知识分子对乡土的想象性改造,现代化进程则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及全球化引发的社会文化冲击和那种似乎不可逆转的乡土“失落”的命运。

1. 现代启蒙意识的视角

正如上文所说，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需要创作者具备现代的眼光、意识和关怀，“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的‘反观’与‘反思’”。^[19]“五四”以来的大部分中国作家都来自农村，在离开农村进入到城市之后，他们所面临的是以往建构在传统乡土社会基础上的价值认知及思维模式遭到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和渗透，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转换过程，当他们再回过头去看待乡土时，不管他们自身是否愿意，现代城市文明已经成为他的参照物。在这种冲击和渗透下，创作者自身的主体文化构成会影响他的选择，无论是周作人给出的“地方色彩”，抑或鲁迅给出的“侨寓”、“乡愁”，还是茅盾所讲的“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这些理念的背后都隐含着现代意识的不同作用方式：“地方色彩”讲求的是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建设多元差异的个性文学，其实“地方性”本身是世界主义话语生产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普遍意识形态；而“侨寓”、“乡愁”则是现代性困境的自我意识凸显，这和鲁迅在《故乡》结尾提出的“路”的诘问一样，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未完成的现代性状态，它以批判的姿态出现，但是进化论的意识形态并不足以提供社会改造的乌托邦图景；以“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对“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的关注则更明确地要求作家关注、认识现实和时代的问题。很明显，尽管都是基于现代性的想象，但是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乡土写作时会呈现为作家与乡土、农民及民间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方式和呈现方式，在一个多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中，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以“国民性”批判和民族国家建构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意识、以主体性确认为基点的地方本位意识和多元世界主义、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现实主义”乡土变革冲动。

乡土文学观念总是无法排解乡土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式紧张感，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观无需赘述；即使是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中强调“地方性与个性”时也是以那种普遍理念为预设对抗对象的；而从沈从文、废名到汪曾祺、张炜，乡土的诗意图写作着重表现乡村的浪漫、农民的纯朴，显现出对现代文明的排斥，但他们同样是在现代文明冲击影响下的一种表现：一方面，他们在创作中表现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不满，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之后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另一方面，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乡土文明的眷恋和怀念，他们眷恋和怀念什么呢？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浪漫情怀，更是一种自由平等、充满生命力的人性的美，而这也同样是现代意识的一种影响和表现，即建立在主体自觉基础上的个性意识。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变革想象，尤其为左翼知识分子和具有强烈社会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坚持，它既不简单等同

于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态度，也不认同地方风土文化的自在性和农民自身能够独立实现自我解放，他们更多关注社会压迫和乡土政治问题，思考从农民到“新国民”的主体重建，追求建立民主、平等、强盛的现代国家。围绕现代性视点建立的关照体系构成了乡土文学研究的主要路向，像黄万华《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赵学勇《二十年代乡土小说与现代意识》、贺仲明《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等都对乡土文学与现代意识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察研究。

2. 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现代性既是作家的一种主观视野，也是被认知的社会文化条件，同时还是一种历史化过程，不同的知识分子基于差异性的认知而作出的不同文化反应也构成了民族现代化的发生语境。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形式，城市化本身则更加凸显了乡土社会的边缘性和农民身份的被动色彩，城乡发展的不均衡重新塑造了乡土认知和审美表现形式。“五四”早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与“农村”是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两个场域，乡土文学更多呈现知识分子的民族想象；但是到了1930年代上海等大都市出现之后，现代市民主体逐渐形成，城市集中了更多的文化资源和传播优势并发展出特定的市民叙事样式，城市与乡村发生了更直接的矛盾冲突，乡土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区别性特征在文学中或表现为层级式社会结构，或表现为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根据地（解放区）乡土写作中以清洗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方式得到解决；“十七年”合作化叙事展现了“另类现代化”模式的探索过程，但是农民与集体化改造之间的冲突主要被阶级斗争所掩盖；1980年代以后的乡土写作，城乡二元矛盾的作者们或者表现了对城市现代化文明的向往，或者表现了对现代化文明背后所带来的道德文化沦丧的排斥和反省，如路遥、王润滋、张炜等人的作品都呈现了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然而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向城市，“向城求生”，丁帆将此群体命名为“城市异乡者”，乡土文化和乡土身份更具有流动性，“‘乡村/城市’的基本社会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都市与乡村之间的双向的流动创造了当下中国最复杂而又丰富多姿的生活景观”，^[20]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些有关城乡流动性的研究成果，如郜元宝《评尤凤伟〈泥鳅〉兼谈“乡土文学”转变的可能性》、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轩红芹《“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等。

（二）文化反思和文化探求的路径

这里的“文化”比较接近1980年代寻根文学挖掘“民族深层文化结构”所指的“文化”概念，主要对应作为乡土历史、民族生活、观念价值等“文明”意义的文

化形态,这种研究路径包括文化比较、民间文化研究和传统、地域考察等基本的视角。

1. 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

虽然乡土文学的产生与西方文化有关,但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文化的影响和延续下,乡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并非仅仅意味着故乡、故土,乡土还凝结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考察乡土文学中蕴含着的传统文化,或把握传统文化因素对乡土文学的影响,是这一视角的主要研究方向。赵园较早地从这一角度进入,他在《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专著中考察了乡土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影响,认为一方面是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一种对大地的依恋和想象,乡土作家无论如何批判或背离故乡,他们都无法完全剥离与故乡的精神联系。赵园曾在解读端木蕻良的作品中说:“谁不了解土地在中华民族历史生活中的意义,谁就无法了解这个民族;而谁若对中国知识分子与土地的联系一无所知,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21]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是经由现代意识来观照乡土,但他们本身对于大地的依恋,却并非完全来自现代意识,甚至蕴含着某种对现代性的拒绝和排斥。这种眷恋和怀念,对大地的顶礼膜拜,源于一种内心的冲动和想象,是几千年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一种融入野地的本源归属,还有一种热爱。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张新颖《大地守夜人——张炜论》等文章都是从大地膜拜角度出发的一种阅读感受。

陈思和、王光东等学者则通过“民间隐形结构”、“民间文化形态”来阐释乡土写作中隐含的、与知识分子启蒙传统并存的民间传统,正像韩少功所指出的那样,“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22]这种民间传统往往是乡土写作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从根本上突破了现代性和乡土政治的阐释模式,有助于推动本土理论话语的重建。

2. 地域文化的视角

“地方特色”、“异域情调”、“风土人情”一直是乡土文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正是建立在这一系列概念之上。199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著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严家炎在此书“总序”中提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仅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越大。确切点说,地域对文学

目 录

前言 1

乡土文学的观念

周作人	旧梦	2
	地方与文艺	4
郁达夫	农民文艺的实质	6
鲁 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11
茅 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4
	关于乡土文学	18
上官等	揭起乡土文学之旗	21
孙 犀	关于“乡土文学”	34
雷 达	刘绍棠 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	36
蹇先艾	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	45
冯骥才	关于乡土小说	47
范伯群	论“都市乡土小说”	50
丁 帆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概念确定与演变	63
余荣虎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	71

乡土文学史论

凌 宇	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	84
吴福辉	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论京派小说	94
张 永	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主题与民俗意义	107

目

录

1

邵基麟	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19
萨支山	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 ——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	129
王又平	从“乡土”到“农村”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考察	141
赵园	回归与漂泊 ——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	153
丁帆	乡土小说的多元与无序格局	166
南帆	启蒙与大地崇拜：文学的乡村	175
徐德明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	189
王光东	“乡土世界”文学表达的新因素	198
施战军	论中国式的乡村小说的生成	206
孟繁华	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 ——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	218
陈仲义	乡土诗学新论	228

乡土文学的观念

